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译著《美国人的性生活》

第11章：艾滋病

作者: 潘绥铭、李放 译 来源: 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类别: 译著《美国人的性生活》 日期: 2004.03.12 今日/总浏览: 1/1970

第十一章

艾滋病

(后半部分)

表19A、表19B和表19C都显示出: 更重要的也许是, 那些做过化验的人, 跟那些18岁以来拥有性伴侣最多的人相比, 跟那些在最近一年里性伴侣最多的人相比, 都不成比例。在那些最近一年里根本没有性伴侣的人里, 只有19%的人去做了化验。但是在那些最近一年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里, 却有25%的人去做了化验。而在那些最近一年有过多个性伴侣的人里, 则有35%还多的人去做过化验。

当我们问被访者, 他们是否由于艾滋病的流行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时, 30%的人说是的。他们主要是较年轻的人和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他们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和收入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种族方面却有所差异。说自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的人, 在黑人中占46%, 在西班牙后裔中占37%, 而在白人中只占26%。此外, 从婚姻状况方面来看, 在目前有婚者里只有12%的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 但是在同居者里却有40%的人; 在单身者里有32%的人已经这样做了。

在表19的各分表里可以看出, 性伴侣人数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强烈。在那些18岁以来没有性伴侣或者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中, 只有大约10%的人说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但是随着迄今为止所拥有的性伴侣人数的增加, 改变自己性行为的人数也在增加。迄今为止有过20个以上性伴侣的人里, 说自己改变了性行为的人占63%还多。在那些最近一年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人里, 却只有20%的人说他们改变了行为。但是在那些最近一年有过两个到4个性伴侣的人里, 这样做过的人达到68%; 而在那些最近一年

有过5个或者更多性伴侣的人里, 由于艾滋病流行而改变行为的人则高达76%。

显然, 前去做艾滋病化验的人和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的人, 就是那些处于风险之中的人。因此, 在那些目前有婚而且专一的人里, 只有10%的人说他们改变了行为。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不大, 也许并不需要去改变自己的性行为。而那些面临风险的人们则觉得他们需要去验证一下, 自己是否被感染了, 并且开始改变自己的性行为。当然, 这也是成年人在性行为方面善于选择和善于改变战略的又一个例子。

尽管我们的数据已经说明了, 感染艾滋病的最大风险在于性伴侣的人数很多, 表现为最乐于去化验艾滋病和最乐于改变自己的性行为, 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弄清楚艾滋病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以上数据只能说明, 在特定的风险群体中, 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这就是希望的标志。不过, 要想知道艾滋病流行的性方面的因素,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学习其他研究成果, 例如关于美国人的性举止的研究, 关于不同群体之间在性方面的联系的研究等等。

我们相信，研究艾滋病传播的最好思路是：集中研究社会行为，因为社会行为是可以象其他行为一样去研究的事物。例如，艾滋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美国人从事性交、他们有多少个性伴侣、这些性伴侣又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了了解艾滋病会不会在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中间传播开，我们就需要知道，男同性恋者有多少个性伴侣、这些性伴侣是多大年纪、他们是否从事安全的性交，以及在当地的社区里，已经有多少人被感染了。为了了解艾滋病病毒会不会从已经被感染的男同性恋者中传播到双性恋者去，我们就需要知道，双性恋男人都跟什么样的人性交、这些人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社会网络又是什么样。如果一个有婚的男人，住在波塞（Boise）或者衣达合（Idaho）那种几乎没有艾滋病病人的城市里，但是他与一个男妓性交过并且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然后他又回家去；那么，他的妻子会不会也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呢？如果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少男，跟一个男同性恋者性交并且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然后他又与他的女朋友性交，那么他的女朋友会不会被传染呢？

问题还有另一面。艾滋病在吸毒者中间很猖獗，吸毒者已经成为艾滋病的第二位的高发人群。目前，男同性恋者中新增加的被感染者，已经比80年代初期少得多了。但是在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侣中间，这一比例却并没有下降。为了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些住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或者住在内地城市以外什么地方吸毒者们，是怎样互相传递毒品和互相发生性交的。被感染的吸毒者会不会把病毒传给他们的邻居，甚至传染给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其他种族的人？那些住在贫民地区的人们，会不会与那些住在别处的人发生通常方式的性接触？吸毒者有多少个性伴侣？他们又些什么样的人？当吸毒者与自己社区之外的人共用一个针头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中产阶级的吸毒者会不会跑到临近的穷人区，去跟一个当地的吸毒者共用一个针头？

我们的调查可以回答这些问题里的一部分。至于别的问题，则需要用大批科学家所做的其他研究来回答。

在这些问题里，有一个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在本书第9章里我们说过，大约3%的成年男人说他们自己是同性恋者；有2.5%的男人说，在最近一年里，他们曾与另一个男人性交过；还有5%的男人说，自从他们18岁以来，他们曾与别的男人性交过。

我们还发现，男同性恋者倾向于避开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住到大城市里去。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全国前12个最大的城市里，说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男人高达9%；但是在小城市里，却只有2%的男人这样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在乡村地区，只有1%的男人这样说。

这些发现对于理解艾滋病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男同性恋者倾向于住在大城市里，因此任何一个从事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流行病学家，如果不理解这些情况，就很难在大城市里开展他的工作。大城市里的男同性恋者为数众多。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某些社会群体里的男同性恋者拥有大量的性伴侣，而且他们相信艾滋病病毒是很难传播的。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在纽约和旧金山那样的大都市的同性恋者社区里，艾滋病病毒悄悄地蔓延开来。那时候在这些城市里，有些男同性恋者前往公共浴室，与陌生人互相发生性行为，展示着他们刚刚获得的性自由。1982年，艾滋病刚刚出现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曾经调查过男同性恋者。访谈员发现，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的性活动次数，是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的两倍。他们去公共浴室的次数也是其他人的两倍。他们的性伴侣则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比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的性伴侣所拥有的性伴侣人数要多得多。其中某些男人所拥有的性伴侣之多，绝对超乎人们的想象。在80年代前期，被调查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报告说，他们到那时为止平均拥有过1,100个性伴侣；某些人的性伴侣甚至更多。这些数字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一个匿名的公共浴室或者俱乐部里，一个男人仅仅在一个周末，就确实可能跟12个或者更多的性伴侣从事肛门性交。

此外，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的男人说，他们经常进行肛门性交，而科学家已经发现，这恰恰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性行为方式。虽然在单独一次肛门性交里，艾滋病病毒是难于传播的，但是如果拥有如此众多的性伴侣，如此频繁地进行肛门性交，那么就会使病毒的传播更加便利。还有，许多这样的性活动频繁的男人，经常来往于各大城市之间，例如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等。每到一处，他们都前往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这样一来，艾滋病病毒就传播到其他大型同性恋者社区里去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者都是如此。那些被感染的人，往往是那些前往公共浴室、进行偶暂式性交的人们。其他男同性恋者则安静地生活着，只跟一个或者很少几个性伴侣从事性交，结果他们逃脱了被感染的命运。还有一些住在最大的同性恋者社区之外的男同性恋者，虽然也有许多性伴侣，但是也逃脱了。此外，全国研究理事会的报告提到，住在纽约哈莱姆地区的57位黑人，每人都只跟专一的性伴侣进行性交。结果，尽管他们也并不使用避孕套，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之内，再也没有其他性伴侣。因此，虽然艾滋病已经毁掉了最大城市里的同性恋者社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社区都蒙难了。一个人是否处于艾滋病的风险之中，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

那么，吸毒者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在80年代里，随着先是可卡因，后是海洛因的传入，对于吸毒的恐惧席卷了全美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论着毒品威胁的增长。一时之下，毒品，包括海洛因那样的注射毒品，似乎威胁到了每一个人。我们被告之，现在，毒品已经不再仅仅是穷人的问题，而是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看到一篇又一篇关于中产阶级或者专业人员吸毒成瘾的报道。《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发表了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男性专业人员如何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秘密地使用海洛因而且成瘾。

但是，真正研究毒品问题的专家们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部分吸毒者都是往静脉里注射海洛因。这些人主要是内地城市里的穷人，绝大多数是黑人和西班牙后裔，其中又大多数是男性。这样的人一旦吸毒，很快就会落入恶性循环：先是吸毒成瘾，然后丢掉工作、长期失业、拚命寻找毒品、被捕、被判罪、进监

狱，获释之后又再一次地进入这个恶性循环。静脉注射吸毒者往往也结婚，但是也往往由于吸毒而离开自己的家庭。他们虽然住在城市里，却总是与世隔绝，往往只有在偷盗时，或者在被捕后见到警察和其他法律界人士时，他们才会与非吸毒者发生接触。

既然他们被置于这样一种相对隔绝的社会境况之中，他们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到其他社会群体中去的可能性又能有多大呢？

西尔莱·林登保姆（Shirley Lindenbaum）是纽约市立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本书作者之一的约翰·盖格农和他都是全国研究理事会下属的艾滋病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一起研究纽约市艾滋病的流行情况。他们认为，这样的吸毒者不大可能把艾滋病传播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在《艾滋病在美国的社会冲击》这份报告中，他们写道：“静脉注射吸毒者显然是一些相对不大流动的人群。他们依赖于左邻右舍所组成的强大社会网络。他们必须与沿街兜售的小毒品贩子和大毒品商建立和保持长期的社会来往。这些人的性伴侣和子女也是相对定居的。他们往往与吸毒者一起住在同一个居所里。”

如果吸毒者只是留在城市里的一小块区域中，并且互相之间共用注射针头，艾滋病显然是非常容易传播的，但是也只局限于邻里之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有一个首先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然后才能很快地传播给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天都跟一个被感染的人共用针头，其他吸毒者被感染的可能性极高。在许多象纽约那样的大都市的市内聚居区里，有50%到70%的吸毒者被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病毒也很容易传播给吸毒者的性伴侣。这是因为，虽然在单独一次性交中病毒很难传播，但是如果一对性伴侣反复进行无防护的性交，传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例如，如果一个女人是一个静脉注射吸毒者的性伴侣，而且从来不用避孕套，那么即使在仅仅一次性交中，她也有500分之一的可能被传染上病毒。如果她跟他有过10一次性交，那么她被传染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到50分之一。如果她与他进行过100一次性交，那么她被传染的可能性就会达到六分之一还多一点。如果她被感染了，那么在她怀孕期间，她的孩子就有20%的可能性被传染上病毒。

另一方面，如果艾滋病病毒并没有进入一个吸毒者的社会网络，那么即使这些人共用针头，他们也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

在同性恋者聚居的地方，在吸毒者聚居的最贫穷的地区，往往有大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这些地方，病毒的传播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病毒要传播出这些区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传出必须具备两个其他条件。第一个是：在其他群体和艾滋病高风险群体之间，必须存在着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一个长期的通道，双方才可能持续地、频繁地进行性接触或者共用针头。第二个条件是：在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必须存在着频繁的、非专一的性行为，或者存在着频繁的共用针头的行为，艾滋病病毒才能传播开。

我们的调查结果强烈地显示出，这些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确实有一些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吸毒者的性伴侣的人，也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例如前面提到的玛丽·费舍尔。据她自己说，她的丈夫注射吸毒而且共用针头，结果把病毒传染给了她。还会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况。假如一个住在长岛的男同性恋者秘密地前往纽约市区，并且跟一个男人发生了性交；那么他被传染之后，又会传染他的妻子。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在非吸毒者的异性恋者中间就一定因此而出现艾滋病的大流行。在上述两个例子里，艾滋病的传播链到了玛丽·费舍尔就终止了，到了那个长岛男人之妻那里也就终止了。病毒确实可以溜出它原来所在的群体，但是它跑不了多远。只有一种途径能使病毒从原来所在的群体传播到一般异性恋人口中去，那就是，每个人都把病毒传染给另外的一个人或者很多人，然后刚刚被感染的人再传染给其他人，而且不停地这样做下去。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们对于性的社会网络和性行为的调查结果强烈地显示出，那些关于艾滋病会大规模传入普通人口的种种危言耸听之辞，都只是期望，而不是规律。

艾滋病病毒传播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已经被感染的群体与尚未被感染的群体之间，必须存在着长期的和频繁的性接触。目前已经被感染的群体中，最大的是男同性恋者群体。如果要把病毒传播到异性恋人口中去，男同性恋者要么跟双性恋男人频繁地性交，然后这些双性恋者再跟许多女人频繁地性交；要么男同性恋者自己去跟许多女性伴侣频繁地性交。但是即使果真如此，主动权随后就掌握在那些已经因此而被传染的女人的手里了。她们必须再跟众多的男同性恋者频繁地性交，才能使艾滋病病毒进一步传入一般人口。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里，没有一个能证明，现在存在着大量的上述那样的男同性恋者；也没有一个能证明，那些已经被传染的女人拥有许多男性伴侣。因此，我们的调查数据也就没有一个能证明，艾滋病将在美国进一步传播开。

至于静脉注射吸毒者，他们可能传染的那些性伴侣，绝大多数都是跟吸毒者很相似的女人或者男人。这就是我们的数据一再证明过的规律：人们总是跟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性交。

由于异性之间的传播需要频繁的性交，因此吸毒的男女最可能把病毒传播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此外，由于他们的性伴侣也同样拥有一些跟自己相似的性伴侣，所以如果传播的话，也是传给那些与吸毒者相似的人们。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也是难于广泛传播的。这是因为，女人传播给男人的可能性，要比男人传播给女人的可能性小得多。由于大多数黑人女性和大多数西班牙后裔女性都只有很少的性伴侣，因此她们即使在自己的社区里，也不可能把病毒传播得很广，当然更不可能广泛地传播给那些与她们在社会特征上不相似的人们。

一个不是吸毒者的、中产阶级的女人，不大可能跟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与邻居朋友共用针头的、结果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吸毒者发生性交。在一般人口里，静脉注射吸毒的男人很少。因此，一个女人同样不大可能跟一个中产阶级的、静脉吸毒的、与被感染者共用针头的男人发生性交。当然，这种情况总会有的，但是却不可能很普遍。在女性里，静脉吸毒的人比男性里要少得多。而且，男人从女人那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概率，要比女人从男人那里感染的概率小一半。因此，只要这种性别差异继续存在，那么艾滋病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嫖妓的男人会被传染，而且把病毒带回自己所属的异性恋者社区。但是我们发现，每年里嫖妓的男人很少，只有6%。另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与妓女的单独一次性交，如果不使用避孕套的话，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概率大约是万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

即使罕见的、从高风险群体向低风险群体的传播确实发生了，那些被传染的美国中产阶级成员也不大可能继续把病毒传播到一般人口中去。这是因为，如果要发生这种情况，还必须有第二个条件：美国中产阶级里，必须有一大批人与众多的性伴侣频繁地性交，或者与很多人一起共用针头。

我们的调查数据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示出，大多数美国人的性伴侣人数非常有限。这使得艾滋病难于传播。只有象淋病那样易于传播的疾病，才会从它最初出现的群体里向外传播。但是即使是淋病，也只存在于少数美国人中间。这些人在较短的时期内拥有较多的性伴侣，而他们的性伴侣也拥有较多的性伴侣。可是艾滋病比淋病更难于传播。一般来说，它需要在已经感染者和尚未感染者之间发生更多次的性交。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数据已经显示出，大多数美国人的性交频率相当低，而且性伴侣也非常少，在成年以后只有一个性伴侣或者根本没有。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里说过的，我们发现，有83%的美国成年人，或者根本没有性伴侣，或者在最近一年里只有一个性伴侣而且忠实于他们的性伴侣。在那些不是卖淫者的异性恋者中间，象艾滋病流行初期就感染上病毒的男同性恋者那样平均拥有1,100个性伴侣的人，绝对是少而又少。即使艾滋病的传播只需要比这少得多的性伴侣，比方说每人平均100个吧，甚至50个，病毒也不会在美国异性恋者当中大逞凶狂。这是因为，它所需要的第二个条件是：不仅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多个性伴侣，而且人们的性伴侣也必须拥有多个性伴侣。这个条件现在并没有具备。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画了一个性网络的示意图，以便显示最近一年里一群人之间的性接触。图20就是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而绘制的。它可以说明，人们之间的性接触实际上是多么地少。

图20 性网络示意图



注释：每一个黑点代表一个男人，每一个白点代表一个女人，每一条线代表最近一年里的一个性关系。

在图20里，每一对连接起来的点都代表那两个人在一起进行过性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73%的美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因此图20里才会有那么多互相隔开的两点一线。由于11%的美国人没有任何性伴侣，因此图20里才会有许多孤零零的点。其余的点和线代表那些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可以看出，那些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也倾向于跟那些同样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结成性关系。

与此相反，在一个典型的社会网络示意图里，应该有许多线把每一个人跟其他几个人连起来，而那些人又跟另外几个其他人连起来。在那样一个密密麻麻的社会网络里，不管你把人與人之间的来往叫做什么，哪怕用极其政治化或者情感化的字眼，一个人跟另一个离得很远的人之间的交往，都必然是很容易的，而且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是艾滋病的传播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交往，不是仅仅交谈而已，而是必须发生性交或者共用一个未经消毒的针头。所以，我们所画的表20才会如此稀疏。

我们的结论是：已经感染的群体和尚未感染的群体之间，性接触过于稀少。通过这种途径被传染的极少数人所拥有的性伴侣也过少，而他们的性伴侣所拥有的性伴侣也同样过少。因此这种情况难于使艾滋病流行起来。对于象艾滋病这样难于传播的任何一种病毒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该疾病很难传出它目前正在肆虐的那些群体。

因此我们相信，艾滋病现在是，可能仍将是只局限在它最初所传播的那些风险群体之内，也就是局限于男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侣之内。我们确信，在美国的异性恋者当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会出现艾滋病的流行。

事实上，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尽管10年来一直有人警告说，人人都有艾滋病风险，但是艾滋病并没有传播开，而是始终留在一开始它所出现的地方。此外，正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很少有人为了预防艾滋病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行为。正如全国研究理事会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艾滋病依然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理上隔绝的群体中，一个是群体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侣，另一个是男同性恋者。即使在艾滋病最猖獗的纽约州，艾滋病也只是集中在纽约市。在纽约州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中，87%是住在纽约市。即使在纽约市，情况也是一样的：艾滋病只集中在6到10个聚居区里。在这些聚居区里，云集着男同性恋者，或者住满了静脉注射吸毒者。

预防艾滋病行动者一直在说，甚至克林顿总统都说，艾滋病传播得如此之广，如此之快，以致于现在每一个美国人都认识一个艾滋病患者。那么事实如何呢？毫无疑问，这是不真实的，尽管每一个美国人都确实认识一大批人。我们在对社会网络进行分析时已经计算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识2000个到6000个其他美国人。这个数字可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你回想一下，你这一辈子一共认识多少人，就不难理解这个数字了。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了你的邻居，然后是你的老师和同学、你在暑假打工时遇到的其他人、附近商店里的售货员、你自己的家人、婚后对方的家人等等。而且，你认识的人还在迅猛地增加。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询问被访者，他们是否认识一个艾滋病患者时，说认识的人只占到25%。

正如我们所假设并且证实了的，男同性恋者倾向于接受过更多的教育，而所有受教育较多的人又倾向于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网络，因此越是受教育多的人，就越是倾向于认识一个艾滋病患者。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看，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里，认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人，比只受过高中教育者里同样的人，要高出两倍半。

艾滋病虽然并没有扩散，但是它的性质却正在改变。它在男同性恋者中愈来愈少，但是却越来越集中于穷人区。这是因为，许多男同性恋者日益了解到，那种频繁的、无防护的性交会带来恶果，因此改变了他们的行为。高风险性行为的时代已经过去。公共浴室不象往日那么普及了。虽然艾滋病继续在某些男同性恋者的社区里肆虐，但是大多数城市报告说，男同性恋者中新增加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有所减少，或者下降了。艾滋病似乎正在退潮。但是与此同时，艾滋病却日益流行于穷人聚居区，流行于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侣当中。在那里，行为很少被改变。在那里，社会对这些人的众多困难采取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

全国研究理事会的报告说：“我们这份报告的基本理论是，必须关注艾滋病流行中的社会分层、歧视和不平等，而艾滋病传播的实况也正是如此。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艾滋病扎根于那些被社会所忽视的群体之中。随着艾滋病的发展，它将日益变成只存在于那些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无权无势的人们当中。”该报告接着又说：随着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随着受教育较多的男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少而最穷的贫民窟里却越来越多，艾滋病可能会变成一种社会认为可以不予理睬的疾病。“如果目前的这种流行模式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最多15年以后，美国社会终将遇到它的最初冲击。艾滋病可能象天花一样‘消失’，但并不是因为它真的被扫除了，而是因为它所继续危害的，只是那些社会视而不见的群体，那些被多数人口所忽视的群体。”该理事会的成员们郑重地、充满激情地申明，美国绝不应该让这种局面出现。我们诚心诚意地赞成。

我们那些证明艾滋病并没有在总人口中蔓延的数据，那些说明它不可能如此蔓延的数据，就是我们提出预防艾滋病对策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目前所发动的、针对一般人口的、警告说“人人都有风险”的公共教育战役，并不是有效的。我们不应该再以这种“广种薄收”的方式来花钱，而应该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到那些正在蒙受艾滋病之苦、正在不断地死去的人们的身上，集中到那些艾滋病风险最大的人们的身上。

其次，如果期望青少年们由于害怕艾滋病就不去发生性活动，那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教诲他们：这么小的年纪是不需要性的，而另一方面又恫吓他们：性会杀了你；那么我们必败无疑。事实上，这样的教诲加恫吓已经推行了10年之久，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少男少女和青年男女已经停止性交了。不过却有一些证据证明，他们比更老些的成年人更多地采取了防护措施。

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美国可以或者应该否认艾滋病的存在。我们所要说的是，当艾滋病袭击那些穷人里最穷的人口时，我们应该象它袭击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时一样，发起同样积极的反击。我们也承认，很难争取到研究经费去研究一种并没有威胁到大多数美国人的疾病。但是我们更加相信，与其象一个兜售恐慌的人那样，不管调查数据证明了些什么，只顾对这个国家说：一个魔鬼不久就要吞掉我们每一个人啦，还不如说出真相。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